

●管继平

文人手札渐成收藏热点

民国文人书信，近些年来颇受关注。尤其是书画拍卖市场上，更是异军突起，连创佳绩，如前几年的嘉德秋拍上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书札均拍出了230万和414万元的高价，而鲁迅先生1934年致陶亢德的一封仅220字的书信，却以655万元的高价位成交。

书信尺牍，自古就是书法传承的最佳载体，如二王的《平安帖》《寒食帖》等，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么？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，虽残纸片楷，或真伪尚有争议，但只要递嬗有据，也一样为世所珍。最著名的一例，如2013年中秋纽约苏富比“中国古代书画精品”专场拍卖中，苏轼的《功甫帖》，仅两行9个字，最终被沪上的一著名藏家以822.9万美元拍下，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，折合每个字约为559万元。《功甫帖》即东坡先生写给其亲密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，字数虽少，却极富神采，历代鉴藏家均对《功甫帖》评价甚高。据翁方纲考《宋史》，认为“功甫帖”乃苏轼三十六岁时所作，作品结构紧密，气完神足，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。而在2016年5月15日中国嘉德的一场书画珍品拍卖中，唐宋八大家曾现唯一传世墨迹《局事帖》，又以1.8亿元落槌，加佣金成交价为2.07亿元。这件不足一平米的书法作品共124字，平均每个字的价格达到167万元，如此也成为史上最贵的“纸片”。过去所谓的“一字千金”之成语，在今天的形势语境下显然不敷使用了，动辄一字百万金，忽已成了家常。

也许古代的书札因年代过久，故造成专家鉴别的难度和争议的问题也多，相对而言，民国时代的文人书信因去时不远，则更受藏家喜欢。就近年的书画行情来看，梁启超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，其市场的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。究其原因，首先是名人书信具有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，再者，书信中所涉及的文人之间诸多内容，较之于通常的诗词警句等书法题材，无疑更具收藏价值。

一般来说，对于名人书札的价值评定，有一条基本标准是，历史越久远，名头越厉害，书札内容与重大事件越有关，那么其价值就越高。就近百多年的历史来看，人们更感兴趣的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，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，譬如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一批文化名人，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站在时代前列，对历史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，属于标杆性人物，他们的书信手稿可以为大时代提供更多的研究信息。记得在2009年春拍中，陈独秀、梁启超与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书信，曾创下744.8万元的成交高价。梁启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徐志摩都是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于文化运动中的关键人物，他们身处历史事件的中心，许多信息都可以成为这个大时代的注脚。在2013年嘉德春拍中，一页鲁迅的《古小说钩沉》残稿，只有短短两行字，后来由周作人在稿纸的末端再加题了两行文字：“右为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时手稿。时在民国初元，距今已五十年矣。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，知堂附记。”说明这页手稿为鲁迅真迹，随手寄给当时香港的鲍耀明。这样一来，新文化运动史上的著名“二周”皆在一件手稿上“相遇”了，所以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。最初估价60万至65万，最终则以690万元的天价被藏家收入囊中，高于起拍价的10倍。鲁迅先生的手稿，一直是拍卖市场上最受关注的热点，在2015年12月，北京拍场上一件日本回流的鲁迅书法小斗方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；放下佛经，立地杀人。”以75万元起拍，经11轮激烈竞价，最终以304.75万元成交。若计算下来，平均每一个字约19万。在2016年4月的一场西泠绍兴春拍中，鲁迅的一枚1928年致章矛尘的信封皮，22万元起拍，42万元落槌，加佣金也须48.3万元了。不过，尽管鲁迅手稿的单字均价无人可及，但单项手稿的最高纪录却不是鲁迅而是茅盾创下的：2014年1月7日，在南京某拍卖公司中国书画专场，茅盾手稿《谈最近的短篇小说》（共30页9000余字）经过44轮的激烈竞价，最终以1050万元的价格落槌，加上15%的佣金，成交价达到1207.5万元，创下了中国文人手稿的拍卖新纪录。



除了鲁迅、胡适之外，如弘一大师、知堂老人等，其书信手稿一旦于拍卖会上出现，只要传承有绪、脉络清晰，每每皆引起买家竞相争抢的效应，价格也就一路飙升。2014年西泠印社十周年庆典的一场秋拍，弘一法师的一件行楷书横幅仅“放下”两个字，以38万起拍，经过了近50轮竞价后，最终以471.5万的天价成交。而2014年5月，在北京上拍的一批周作人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信札共84通，又以700多万元的高价成交。由此可见，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其后又因出任伪职而沦为“汉奸文人”，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，使他无疑更为人们所关注。这批书信皆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1966年，正好是周作人的最后十年间，内容涉及了文学、社会经济、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，对研究和了解周作人晚年的思想、生活以及观点、情趣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。

当然，作为一般的藏家或名人手稿收藏爱好者来说，一线名人的手稿虽好，但万众瞩目，其价格往往是最可望而不可及的。2017年6月，保利春拍夜场，单是傅雷一张手书菜单，估价5至8万起拍，结果也52万成交；同时保利的一场“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名人墨迹文献专场”中，有一通李大钊致辛白的信札以及陶孟和致李大钊信札，成交价为356.5万元人民币，令人惊叹。另外，除了墨笔书信受追捧外，硬笔信若写信者名气大的话，也一样被格外关注，如2017年6月匡时春拍，一页徐志摩致胡适的钢笔信，报告母亲病故的信息，最终以43万成交，算是开了钢笔信高价之先河……而我财力有限，则更喜欢关注一些并非炙手可热的名人手稿。我以为收藏最讲究的是一个缘分，或众里寻芳，或不期而遇，幸而得之，皆有一份自在，且两情相悦，皆大欢喜。有时即便是人弃我取，又何尝不是一乐？所以，近年来由

于缘分的惠顾，也使我获得了如张元济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陆澹安、陈巨来、郑逸梅等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信手札。在收藏上我从未有过那种在所不惜、志在必得的豪举，人生如寄，因缘和合，其实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必须拥有的。

如今，随着收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，文化名人手稿的书法艺术性得到了重估。而艺术性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文人的书信还体现了趣味性、真实性以及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。比如我们在鲁迅的书信中，常常会看到他收到一笔书稿的版税或一篇文章的稿费是多少，还有托人转送丧仪2元等，这些内容虽然不算重大，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小细节，比如鲁迅还喜欢在书信中月旦人物，直抒胸臆，我们从中也可以窥探他与书信往来者的亲疏关系、对他人的态度等。因为书信是写给亲友的，是一对一的关系，它不求公开，不事雕琢，这就可能包含了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，那么也更逼近事件的真相，更见人物性格。

最后，还不得不提醒的是，作为艺术收藏而言，只要能产生巨额利润的事就会有人造假牟利，于是在信札手稿收藏上，仿冒的赝品现象同样存在。虽然，我们知道手稿信札的作伪比一般的书法作品更有难度，因为它的内容具有唯一不重复性，它的字迹也随意，更见作者性情。但尽管如此，还是不乏赝品的存在。对于初涉此领域的爱好者，一定要了解信札的来源，这是鉴别其真伪的最重要因素。如果是来自受信者的家藏，或者是缘自文化名人与同时期晚辈亲友间的转赠遗藏等，则来源较可靠，可信度较高；其次，要尽量收藏自己熟知和了解的人物，否则懵懂“下水”很容易被呛到；最后，收藏书札还要注重手稿信札的品相以及是否保存完整，如果是信封和信函齐全，传承脉络清晰，那毫无疑问，就是藏家最为看重的佳品了。

丁申阳：各位书法同道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由我受上海书协的委托来主持“从金庭走来”——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作品上海展的草书论坛。草书乃是各种书体中最有抒情性和最具艺术性的书体，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老师在全国书法界具有重大影响，尤其在草书的创作及理论上都各有建树。首先我们请刘洪彪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关“草书盛世”的宏大观念。

刘洪彪：大家下午好！首先我要代表陈加林先生、王厚祥先生及中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，对上海文联、上海书协对我们草书委员会工作的支持，还有对当代草书艺术发展的关注以及参与表示感谢！

今年四月，我们在浙江嵊州的金庭镇举办了“28+盛世草书高峰论坛”。金庭是嵊州这个县级市下面的一个镇，书圣王羲之的墓就在那里。之所以选择在书圣故里举办草书专业展览，一是要弘扬继承书圣的精神，二王创建了我们中国书法行草主流的一脉，对我们后世书法发展影响巨大。二是要把金庭当成我们向草书盛世进发的一个集结点、出发点。

为什么反复地提出“草书盛世”这个概念呢？中国书法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形成了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，回望这段历史，篆隶楷行可以说都在某个时代、某个朝代形成了一个带有时代性、普及性，甚至垄断性的盛世。篆书在秦以前是大篆的天下，在秦以后是小篆的天下；到了汉代，那是隶书的天下。唐代是楷书，二王时期的行书，还有宋代

的行书……而草书始终没有形成带时代性、普及性的盛世。

草书在实用时代，因其难以辨识，不能通行，未成大气候。在艺术时代，则因其气韵生动，变幻莫测，便有了无限广阔的施展天地。因此，三千多年的书法史给我们下了当代书法发展的巨大空间，这个切入点即是为我们当代书家共同来建造新时代的草书盛世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赋予书法艺术的发展机遇。

草书的书写速度是最快的，也是最契合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和当代人的生活节奏，所以草书也最符合我们当代人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。从目前我们各个书法展览来稿量来看，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行草书，其他的书体加在一起总和也就是百分之三四十，根据凡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逻辑，这么多的人参与，这么多的作品，必然会产生一支庞大的草书创作队伍，也就必然会留下一大批草书的精品佳作，这就会形成“草书盛世”。我们要顺应这个潮流和趋势，为共同打造、建造、开创草书盛世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丁申阳：刘洪彪先生不仅从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风格，而且他提出很多观点，比如说字古式新，比如书法的展厅效应等等。最近他又提出“当代书法发展有可能迎来草书盛世”的这样一个观点，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书法大家的一种情怀、一种责任、一种担当。下面我们将陈加林老师来谈谈有关草书的创作体会。

（下转2-3版中缝）

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作品上海展暨草书论坛纪要

近来，一位“抹灰哥”刷屏朋友圈。说的是在温州的一名“九〇后”抹灰工，业余时间爱好写字画画，就是平时上班前、中午下班也要写上一张或临摹几字。《人民日报》官方微博和微信也为他点赞：“有梦想谁都了不起”“哪怕身处尘埃，心中也有山川湖海”。尤其是5月5日，“抹灰哥”家乡的文联领导带领系统职工赴他家中颁发书画院特聘证书，再次让“抹灰哥”刷屏，成为“网红”。

有意思的事，5月5日笔者在《新民晚报》上读到一篇“怎样做网红艺术家”的文章。文中说：“要做艺术网红，还是得先练好艺术内功。”“网络只是传播媒介，艺术家自身的修炼境界才是内容。有精彩的内容，没有到位的传播，可能不行；但没有精彩内容，纵然千般包装，万般传播，也是瞎折腾。”可谓一语中的。

当然，文章并非针对“抹灰哥”而写，不过无巧不成书！由此，让笔者产生一些思考。这两天，笔者拜读了网友、微友以及报刊对“抹灰哥”的评论、留言、撰文等，说法多多，褒贬不一。对“抹灰哥”努力学习之精神点赞的还是居多的，尤其是主流媒体视这种精神为一种“正能量”，值得倡导与学习。但有的微友认为，就“抹灰哥”写的书法而言有待提高，其水平仅仅是在一个书法爱好者水平上，不宜过多渲染，至于书画院为他颁发“聘书”值得商榷。还有的微友认为应该正视看待“抹灰哥”，去否定、去夸大都不利于“抹灰哥”的学习进步，这与书法创作的规律也相悖。刻苦学习仅仅是一种精神追求，不能把“励志”和“热血”视为一种实力和水平。

“网红”是一个时代的产物，它作为在网络媒介环境下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值得关注的。自从进入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“网红”就已打破了过去那种“造星模式”，打破了我们的认知。在传统媒体还没有展开宣传攻势时，“网红”可能已在微信圈、微博上传播开来，无论是审美，还是审丑，都有可能演示为“网红”。有学者认为“网络时代让平民偶像开始崛起”，的确如此。百度搜索一下就不难发现，几乎每日都可能看到有关“网红”的消息，有个人的也有单位的，品种多样，鱼龙混杂。就“书法圈”也是热闹非凡，异军突起，短短一夜间也可从素人成为“流量明星”，从圈外跑到圈内。一个四肢健全的人用脚书法，一个稳重的人吼叫书法，一个内秀的人裸体书法，还有什么双管书法、四管书法、五管书法等。前两年，还出现新婚之夜抄党章，为什么要在新婚之夜去书写呢？有的因为“方便”把书法搭上了神州飞船，就以为自己上天了。还有的为了“网红”，自编自导，吸引眼球，有脸的晒脸，没脸的晒背，以为“网红=成功”，有失常人底线；还有的利用“网红”混入书法圈、艺术圈，放任尊严，制造误读，严重影响了观众的审美判断，削弱了书法艺术的力量。因为篇幅有限，笔者只能在此省略837字了，呵呵！

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安迪·沃霍尔曾说过，每个人都能在15分钟里成为明星。既然“网红”是时代的产物，也不要回避它，我们也无法回避它的存在。“网红”本无原罪，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它是因何而红，为何而红。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“网红”的，也不是所有“网红”的都能成功，要成为称道的“网红”，还是要先学会做人。记得当年，什么“姐姐”在没有对鲁迅先生作全面了解时就公然在媒体上贬低鲁迅；如今也有在没有完全理解书法、了解书法艺术时就随口将别人等同“丑书”之列，这是需要反思的。

“网红”是有层次的，欣赏“网红”也是有层次的，网络为“网红”虽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与途径，但绝不是评判的标准。如何正确看待“网红”，也是一个人专业知识与艺术修养的体现。对于那些有着真才实学“网红”的，我们应该力挺点赞，这也是当今社会需要的一种思想，一种力量。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法家谭（二十三）——翁同运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2003年6月19日，故宫博物院专门延请六位书画鉴定专家对《出师颂》进行了鉴定。专家们一致认为，该作品确为见于历代著录的《隋人书出师颂卷》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；南宋绍兴内府印和卷后的南宋米友仁题跋均真；引首用纸上所绘龙形为明代风格，宋高宗书花押与真迹不符，应为明代拼配，但并不影响作品本身的价值；加之该作品原为清宫收藏文物，后流散于社会，是重要的官藏文物，因此一致建议应将其定为一级国宝。

翁同运极其注重书法传统，但他也总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，如他的《简化字总表习字帖》就是例证。陈寅恪指出：“一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，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……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。”

翁同运极其注重书法传统，但他也总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，如他的《简化字总表习字帖》就是例证。陈寅恪指出：“一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，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……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。”

翁同运极其注重书法传统，但他也总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书法艺术，如他的《简化字总表习字帖》就是例证。陈寅恪指出：“一代之学术，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，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……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，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。”

杨祖柏

也

说

网

简斋闲语